

# 中国选本批评



• 邹云胡 著

SANLIAN WENBO JIJINGONG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选本批评 / 邹云湖 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6

(三联文博论丛)

ISBN 7-5426-1692-7

I. 中… II. 邹… III. 古典文学—文学批评—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6285 号

---

## 中国选本批评

---

著 者/ 邹云湖

丛书策划/ 苏 梦

责任编辑/ 陈宁宁

装帧设计/ 范峤青

责任校对/ 黄曙辉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anlianc@online.sh.cn

印 订/ 苏州吴中区文化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0.5

印 数/ 1—3100

---

ISBN7-5426-1692-7

I·192 定价 21.00 元

# 目 录

总 序	钱谷融(1)
导 言：选本——一种批评	(1)
第一章 汉魏六朝：选本的滥觞	(12)
第一节 汉代选本观念的产生	(12)
第二节 中国古代选本的权舆——《文选》	(16)
一、从“集”又到“选”文	(16)
二、《文选》之“选”	(20)
三、《文选》与当代文学思潮	(26)
第三节 宫体诗的盛行与《玉台新咏》	(29)
一、宫体诗人徐陵	(29)
二、《玉台新咏》之“新”	(32)
第二章 唐五代的文学思潮与选本	(36)
第一节 唐诗的繁荣与“唐人选唐诗”	(36)
一、唐诗创作的丰富与唐人诗选的多样	(36)

二、唐人选唐诗的批评·····	(42)
三、唐人选唐诗的批评价值·····	(52)
第二节 晚唐艳风与《花间集》·····	(62)
一、《花间集》的产生·····	(62)
二、《花间集》的批评及其意义·····	(67)
<b>第三章 宋元的文学思潮与选本·····</b>	<b>(71)</b>
第一节 宋代诗学观念的转变与王安石的 《唐百家诗选》·····	(71)
一、王安石与宋代诗学观念的转变·····	(71)
二、《唐百家诗选》的批评·····	(75)
第二节 程朱理学与《文章正宗》·····	(78)
一、理学家的文学观·····	(78)
二、“明义理”“切世用”的《文章正宗》·····	(81)
第三节 词坛的“复雅”与《乐府雅词》·····	(88)
第四节 实用文风和《古文关键》·····	(93)
第五节 反“江西”潮流与《三体唐诗》·····	(99)
一、南宋诗学观念的转变与《三体唐诗》的产生·····	(99)
二、《三体唐诗》的诗学观·····	(102)
第六节 江西诗派与《瀛奎律髓》·····	(107)
一、方回论诗的宋人眼光·····	(107)
二、《瀛奎律髓》的诗学·····	(110)
第七节 “复古”“宗唐”的元代诗学与《唐音》·····	(119)
一、元人论诗的史家意识与《唐音》的产生·····	(119)
二、《唐音》的批评意义·····	(123)

---

<b>第四章 明代的文学思潮与选本</b> .....	(132)
第一节 《唐诗品汇》与明代诗学主潮 .....	(132)
一、前代诗学对《唐诗品汇》的影响.....	(132)
二、《唐诗品汇》的批评及其意义 .....	(139)
第二节 “前后七子”与李攀龙选唐诗 .....	(149)
一、“前后七子”的复古诗论 .....	(149)
二、李攀龙选唐诗.....	(154)
第三节 “唐宋派”与《八大家文钞》.....	(160)
一、“唐宋派”论文 .....	(160)
二、《唐宋八大家文钞》论文 .....	(167)
第四节 “竟陵派”与《诗归》 .....	(172)
一、《诗归》与“竟陵派”的诞生 .....	(172)
二、《诗归》中的“竟陵”诗学 .....	(178)
第五节 晚明诗学的七子余波与《皇明诗选》.....	(187)
一、晚明诗学重返风雅的追求.....	(187)
二、《皇明诗选》的诗论 .....	(190)
第六节 市民文学的勃兴与通俗选本的产生.....	(196)
一、南戏的繁荣与《元曲选》.....	(196)
二、民歌时调的流行与《市井艳词》.....	(205)
三、小说编撰之风与《今古奇观》.....	(212)
<b>第五章 清代的文学思潮与选本</b> .....	(219)
第一节 “以温柔敦厚为宗”的“御定”与“御选” .....	(219)
第二节 “神韵说”与王士禛的唐诗选本 .....	(226)
第三节 “盛世”的文学批评及其选本 .....	(242)
一、沈德潜的“格调”与“别裁” .....	(242)

二、“清真古雅”的“桐城派”古文选本 .....	(252)
三、盛世的词论与“浙西派”的《词综》 .....	(264)
第四节、清中叶以后的“末世情怀”与选本述略 .....	(270)
<b>第六章 中国选本批评原理综述</b> .....	(282)
第一节 选者与选本 .....	(283)
一、“选者之权力能使人归” .....	(283)
二、“虽选古人诗，实自著一书” .....	(285)
三、“作者难，而操选政为尤难” .....	(287)
四、“选诗非选官” .....	(291)
第二节 “动物园里的动物”——作者与选本 .....	(296)
第三节 “删《诗》之意即读《诗》之意” ——读者与选本 .....	(305)
第四节 中国选本的批评方式 .....	(310)
<b>后 记</b> .....	(318)
<b>主要参考文献</b> .....	(320)

## 导 言：

# 选本——一种批评

选本，顾名思义就是经过选择的（或被选择过的）文本。从文学角度而言，选本是指选者按照一定的选择意图和选择标准，在一定范围内的作品中选择相应的作品编排而成的作品集。因此，选本的界定必须具备目的性（有一定的选择意图和标准）、限定性（在一定范围内的作品中）、选择性（根据一定的选择意图和标准进行选择）、群体性（最后以作品集的形式出现）。“选择”作为一种价值判断行为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文学选本的“选”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批评实践。选者（批评家）根据某种文学批评观制订相应的取舍标准，然后按照这一标准，通过“选”这一具体行为对作家作品进行排列，以此达到阐明、张扬某种文学观念的目的。因此，选本也是一种文学批评方式。

同时，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已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批评”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选择意味：

文学史强调的是本文在历史轴上的重要性，而解释（批

评)则用一种附加的选择法将那样一些本文挑选出来,它们应当在共时轴上重新进入某种审美关系,并进而通过获得新的重要性而归入历史(譬如作为“遗产”)之中。(瑞曼《作品与文学史》)

按照我的想法,批评史不能仅仅讨论永恒的本文,而且不应被贬低为通史或文化史的一个分支。……我有一个观点:我必须对本文和作者进行选择。但要一种完全中立的、纯粹说明性的历史,在我看来只是幻想。任何历史都不可能没有一种思想倾向、某种对未来的预感、某种理想、某种标准以及某种事过后的聪敏。……许多东西必定是“回顾性”的,我不免要从我自己有利的角度来选择和判断。……我承认,文学批评是人的一种独特的活动,从它本身来看就很值得研究。……没有文学,世界将会枯燥无味得难以想象;反之,文学需要批评来提供理解、筛选和评判。(韦勒克《现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和第六卷导言——方法和范围》)

庞德本人并不把批评的作用看得很重,他曾区分两种功用:一,理论上批评设法走在作品之前,充当标尺。尽管我相信,除了对实际的创作者来说,这种先见之明并没有任何有案可查的些许用途;二,剔除。作总体安排,并剔除实际上已被完成的东西,……这种工作就像一个优秀艺术选审委员会或一位博物馆长在国家美术馆或生物博物馆中所要做的事。但是庞德的大部分批评著作是为第二个目的服务的:展示、指出、挑选。他说:“我赞成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展示,百分之二十的喋喋不休。”……对批评家作评价主要是根据他们的挑选,而不是根据他们的空谈。(韦



勒克《现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革新者们：艾兹拉·庞德》）

从这种观点出发，选本所具有的批评特性就更加无可辩驳了。

而事实上，毋庸现代西方批评理论的证明，选本作为一种古老的批评方式早已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中被有效地运用，至少在距今两千多年的汉代，《史记》和《汉书》的“孔子删诗”说证明选本是一种批评的观念已经产生。此后它就与其他后来出现的各种诗话、笔记、评点、序跋等极富民族特色的批评方式一起，一直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批评职能。选本不但自己单独履行批评职能，像中国古典文学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选本《昭明文选》就是如此；而且后来在不少时候，选本更与上述其他极富民族特色的批评方式相融合，大大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内涵。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选本中都夹杂有选者的批、注、评，而一些诗话著作中则常常是论后又选或边论边选，以“选”明“评”，如北宋末年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就是记事、论诗与选诗并存（全书选录了大量的应制、奉和、游宴、投赠、赠答一类的诗作，而对现实性、思想性较强的作品则选录较少，像杜甫不选“三吏”“三别”，白居易也不选其《新乐府》、《秦中吟》等等。）明人胡震亨的《唐音癸签》就认为：“计氏此书，虽诗与事迹、评论并载，似乎诗话之流，然所重在录（某种程度上也是选）诗，故当是编辑家（选家）一巨撰。”又如南宋中叶何汶的《竹庄诗话》与宋末元初蔡正孙的《诗林广记》都只选录有“话”之“诗”（《竹庄诗话》是先“话<诗>”后“<选>诗”；《诗林广记》

是先“<选>诗”后“话<诗>”，且为了与所收评语相对应，此书还对所选的具体诗作进行删节），着眼于诗话与诗作之间的联系比较。此外更还有将选本中的评语单独辑出而另成一部诗话著作的，如明万历年间顾起纶的明诗选本《国雅》前附有《品目》一卷，崇祯年间陆时雍的古诗选本《古诗镜》和唐诗选本《唐诗镜》（合称《诗镜》）前附有《总论》一卷，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时就将它们辑出作为诗话单行，前者题作《国雅品》，后者题作《诗镜总论》；冯煦的词话著作《蒿庵论词》也是其词选《宋六十名家词》（实为六十一家）例言的单行本。而乾隆时张宗柟纂《带经堂诗话》，汇集了两千多条王士禛的论诗之语，其中的“总集类”就收集了王士禛各种诗歌选本的凡例、序跋、题签等。这些都足以说明作为一种批评方式，选本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中的确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具体而言，作为一种批评方式，选本的批评职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选本具有巨大的批评价值。一方面，“选”这一行为使选本具有了很大程度的主观性，使选本首先成为选者（批评家）标举、张扬其文学主张的有效武器；而另一方面，作为“选”这一行为的施动者，选者之“选”也就必然要受到他所处的社会时代环境以及个体才、学、识三者的影响与制约，因此一部选本的产生就往往是特定文学思潮甚至社会思潮的直接产物。选本不但反映出选者（批评家）对文学理论的独特探讨，反映出特定时期的文学思潮，同时选本对作家作品的独特取舍排列也反映出该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学史的不同历史时期地位与声望的盛衰起伏。此外，选本与文学术语、文学流派、文学集团、批评流派的确立，与文学理论的丰富，文学争论的产生等

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世界文学批评的范围内，选本的这些批评价值一再被证明着：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宣告了英国文学浪漫主义传统的建立；爱德华·马什爵的《乔治时期诗选》使“乔治派”诗人正式成为英国文学史上一个专指活跃于英王乔治五世时期诗人的文学集团；“巴洛克”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术语最早即来源于 1921 年德国人鲁道夫·冯·戴留斯的诗选《德国巴洛克抒情诗》；布鲁克斯和罗伯特·潘·沃伦的诗选《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ry*, 1938）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一直被作为教材占据着美国大学的文学课讲坛，这使得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在美国学界崛起的“新批评”派理论得以迅速传播，成为现代西方文论的一个重要流派；而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女权主义批评更藉一本《诺顿妇女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 Selected by Sandra Gilbert & Susan Guber, 1985*）作为她们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将批评重点由男性中心转向女性中心的直接标举。选本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所体现出来的巨大的批评价值更是不胜枚举且极富特色。从批评史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的文学选本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前期多是在文学潮流的裹挟下产生相应的选本，像齐梁文学风气的浓厚与《昭明文选》，宫体诗的盛行与《玉台新咏》，唐诗的繁荣与“唐人选唐诗”等；宋元以后，随着中国文化中“人”的个体意识的日益增强，批评家的主体性也越来越高涨，特别是到了明代，受由心学而起的文学解放思潮的影响，批评家的地位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他们往往直接以选本为武器来张扬、标举自己的文学观念，同时又以选本激起声势浩大的文学批评潮流。典型的像方回《瀛奎律髓》的倡言“一祖三宗”，高棅《唐诗品汇》的推崇盛唐，

张惠言《词选》的专讲“寄托”等等。一部中国选本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理论史，甚至就是一部“特殊的”中国文学史。

其次，选本具有自身的批评机制。选本的批评机制由选者、读者、作者三个要素构成。这三个要素以选本为纽带构成一个环环相扣的“食物链”：首先选者通过选本向读者传达自己的批评信息，读者通过阅读选本接受这种信息，然后以此信息重新调整自己的判断标准，对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价值判断，使其与选者的批评信息相符，达到选者对选本的期望值，选本的批评功能于是得以完成。选本作为连接选者、读者和作者三个要素之间的唯一纽带，它以自身所承载的选者的批评信息为连接的基础。选者赋予选本的批评信息具体又体现为三点：一，从选本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来说，选本能够全面、综合地展示选者（批评家）的批评素质、理论修养和文学观念，所以选者（批评家）可以选本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式。因为有了“选”这一强烈的主体行为，选者通过选本向读者揭示（展示）的实际上是他自己。“此虽选古人诗，实自著一书。”（钟惺《与蔡敬夫》）而且如果选者本人又是作家的话，他就往往不但选择能符合、阐明自己批评理论的作品，同时这些作品也往往是与其本人的创作风格相近的作品甚至就直接选入自己的作品。这样“身体力行”，选本所能发挥出来的批评效力就更大了。像宫体诗人徐陵就在他的宫体诗选本《玉台新咏》选入了自己的作品；唐代诗人芮挺章也在他的当代诗歌选本《国秀集》中选入了自己的诗歌。但此举如太过拘泥的话，也会走入狭径，使读者误入偏颇的歧途，就像明人屠隆批评李攀龙的《古今诗删》那样：“于鳞选唐诗，止取其格峭调响类己者，一家货何其狭也！……”

诗道亦广矣，……何其自视大而视宇宙小乎？”（《鸿苞集》卷一七论诗文）因此中国古典文论十分强调选者的“公心”，意即操选政者必须遵守一定的职业道德，必须坚持一定的公正性，而不能滥用“选”的权力完全以个人喜好对作家作品任意增删，所谓“选诗之道，与作史同，一代才人其应传者皆应列传。”（袁枚《再与沈大宗伯书》）“选”最终还是得取决于作品本身是否具有可取性，而不能以被选者的身份、地位来决定其入选排名，此即前人所说的“以诗存人，不以人存诗”（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序》），“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王士禛《宋诗选序》）之意。二，从选本与文学接受的关系来说，选本能够为读者的文学接受确立经典及其解读模式，所以读者可以选本作为一种文学接受方式。由于作家独具个性的创作与历史发展和文学发展所造成的创作背景与接受背景之间的差异往往会给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带来困难和障碍，读者就需要批评的帮助，以“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袁无涯刻本《水浒传·发凡》），而选本可以说是所有批评中能给读者的接受以最具体、最直观帮助的方式之一。选本首先以选择作家作品并编成文集的方式向读者展示选者所推崇的某一类型或某一角度的经典作品。每部选本又按照各自独特的取舍标准决定其选编体例和对入选作家作品的排序，并通过这些具体的“选”的行为向读者提供其特有的解读作品的方式，使读者和作者在选本中按照选者所划定的轨道相遇、撞合，在选者的“指挥”下，完成从作者到读者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的过程。所以选者的“指挥”，以及选者如何“指挥”，就是实现读者接受的关键。因此中国古典文论极为重视选者本人的修养、素质，认为必才、学、识皆具方可操选政，方能保证选本的权威性和指导

性。盖有才方能“尊其创格”，有学方能“存其面目”，而有识方能“汰其熟调”（钱良择《唐音审体·例言》）。三，从选本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来说，选本还能通过其独特的编排为已有的作者定位，为未来的作者提供可资参考的创作规范，所以作者可以选本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模式。选本通过“选”这一特殊的行为按一定的原则为作家在选本中排列次序，为作家定位。“选集之于诗人犹如动物园之于动物。”（诗人 David Antin 语，见美·余宝琳《诗歌的定位》一文）中国文学史上为数不少的作家都在不同的选本中被推重过。更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作家通过选本获得了文学声望。如据《大唐新语》卷八载，初唐诗人刘希夷“少有文华，初不为时所重”，他因为同代人孙季良在其当代诗歌选本《正声集》中“以希夷为集中之最”而“稍为时人所称”。作家在选本中的排名往往直接影响到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定位。中国古典文论又十分强调选本对创作的示范作用，选本既是选者以之为自己的文学理论确立经典，其必然就有着提供创作范本的意味。中国古代大量的文学选本都把指导初学者作为一个重要的选编目的。而价值取向不高的选本理所当然就会给文学创作带来不良后果。如有明一代，词最衰弱萎靡，“陈言秽语，俗气薰入骨髓”，“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朱彝尊《词综·发凡》），原因即在于：“《花间》、《草堂》、《尊前》诸选，背谬不可言矣，所宝在此，词欲不衰，得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所以中国古典文论在选者的才、学、识三项修养中就最为重视“识”。选者由于受到个人的才智、学养、环境的限制，有“识”就显得殊为不易，正如李东阳所感叹的那样：“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麓堂诗话》）选者是否有“识”，

最终决定着—部选本的存在价值。

最后，选本自身还有着极其丰富、多样、灵活的批评方式。选本之所以成为选本，关键就在于一个“选”字，“选”是选本最根本的批评方式。因此，一部选本的入选作品部分也是整部选本的主体所在，它是选本实现其批评价值，运行其批评机制的直接展开。在这一部分里，选者根据其选择标准和宗旨（当然这种标准和宗旨体现的正是选者本人的文学观念）进行具体的批评实践，通过选、删、增、补、改、编等行为将作品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让读者通过这种排列以及每个作家入选数量、入选风格的不同直接领会选者的选择意图，同时也就具体直观地了解了选者的文学思想，从而使选本的价值获得实现。此外，选本自身又还借助一些其他的批评方式，以期更充分更完全地实现其价值。这主要包括附属于选本的序跋、体例、批点和评注等部分。选本的序跋部分除了选者和其他人所写的序跋外，还包括引、缘起、叙、集论、发凡、凡例等多种形式。中国古代大多数文学选本都通过这一部分尤其是序和凡例直接阐述选编的缘由、宗旨、标准，甚至选者本人的文学观、批评观。某种意义上它指挥、制约着此后整部选本的“选”的行为。选本的体例部分包括各种各样的选择目的、选择方式和编排方式，即回答为何选，如何选的问题。不同的体例往往间接反映出了选者个人的好尚，也是判断一部选本是否具有批评意义的最初依据。像中国古代大量为举业而选的选本，以被选者之地域、姓氏而选的选本，以及按照音韵来编排的选本，从批评学的角度看就没有很大的意义。在中国古代大多数的文学选本中，体例常常不是一个独立的部分，而是分散在序跋部分中。选本的批点和评注部分则是作为批评家的选者与为选本提供作

品的作者和阅读选本的读者直接对话、交流的层面。它也经常是最能体现出选本批评价值的一个部分。从字句的训释，作家作品的介绍和考证，一直到对作品意义的阐发，无不能鲜明地彰显出选者个人的批评个性；而读者通过选者在这一部分的具体指导，也可以更快捷更深刻地把握、了解选者的文学思想、批评观念，使选本的批评价值获得最充分的实现。

中国古典文论对选本批评价值的认识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点：一方面，对选本是一种批评方式的认识一直不很明确。从《隋书·经籍志》直到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中国古代大多数文学选本都被归入到“集部”的“总集”类中，虽然按照传统目录学观点，选本确属“总集”之一种，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述“总集”的产生和作用所云：“文集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立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卷一百八十六）但从批评学的角度而言，这种分类并不足以体现出选本作为一种批评方式，它有别于总结一代之文集和其他传统批评方式的相对独特性与独立性。但另一方面，中国古典文论对选本的批评价值却又极为重视。从《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论“孔子删诗”是“取可施与礼仪”“以备王道，成六艺”开始，对选本批评价值的认识就散见于历代大量的诗话、笔记和各种文集之中，只不过这种重视往往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与阐述，而仅是以对某一选本的具体评价的方式凸现出来。近代以来，选本在文学批评上的巨大价值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著名的文学史家、批评学家像朱自清、方孝岳、朱东润、郑振铎等都专门提及过这一话题，鲁迅先生更还有专文论述（见《集外集·选本》）。这些都是研究选本批评的宝贵财富。



本书即试图从批评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学选本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和研究。全书共分为六章：前五章侧重于研究作为承担着批评职能的选本，中国古典文学选本的产生及其与当代文学思潮、文学批评的关系；第六章则主要是研究作为一种批评方式的中国古典文学选本的批评原理、机制、方法等问题。全书约二十万字。